

谨以此书献给北京理工大学80华诞

HONGSE JIYIN BUJIE DONGLI
BEIJING LIGONG DAXUE WENHUA JIANSHE DE
CHUANCHENG YU SIKAO

红色基因 不竭动力

北京理工大学文化建设的传承与思考

孙 利 刘存福 等 著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BEIJI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PRESS

序

北京理工大学1940年诞生于延安，是中国共产党独立创办的第一所理工科大学。栉风沐雨80载，北京理工大学始终不忘初心，砥砺前行，传承延安精神，矢志国防军工，孕育了“延安根 军工魂”的独特文化基因，书写了中国高等教育史上浓墨重彩的一页。

建校80年来，学校始终与党和国家同呼吸、共命运，始终以延安精神哺育、浇灌校园文化，以国防传统优势凝练特色学科专业方向，始终服从、服务于国家重大战略需求，聚焦重大特色服务面向，坚持和发扬国防优势和军工特色，坚定不移地为国防科技工业服务，在服务国家战略和奉献世界科技发展中展现了北理工人的忠诚与担当，被誉为“红色国防工程师的摇篮”。80年悠久的红色历史，80年倾情的国防军工，铸就了北京理工大学“延安根 军工魂”独特而深厚的精神财富与文化底蕴，红色军工基因在服务国家战略中实现了有效传承。80年来，北京理工大学始终强化文化筑基，对于以延安精神、军工文化为特色的大学文化予以重点建设传承，强化了大学文化建设的基础性、战略性和前瞻性地位，制定下发了文化建设的规划纲要，将文化建设纳入学校发展的总体规划中，明确要大力弘扬延安精神，大力弘扬“两弹一星”精神、载人航天精神，体现国防文化特色，使文化竞争力成为学校可持续发展的核心竞争力之一。新时代，学校把加强一流大学文化建设纳入“双一流”建设方案中，进一步强化“延安根 军

工魂”的精神文化传承，使“双一流”建设根植于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和北理工特色文化的沃土。

一流的大学文化是一流大学建设的灵魂和内核。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办好中国的世界一流大学，必须有中国特色”，所谓中国特色就是在“双一流”建设中确立彰显学校办学特色的“根”和“魂”，体现一流大学的教育自信、文化自信。北京理工大学有今日之成就，正是因为学校秉承了这种“守根铸魂”的自觉意识。北京理工大学也因“延安根 军工魂”独树一帜的文化特色与办学优势构建了学校独特的感召力，使我们具备了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的扎实的文化基础，具备了从大学文化出发形成世界一流大学理念和一流大学精神的先决条件。

传承文化、创新文化、引领文化是世界一流大学的崇高使命与社会责任，一流大学建设本质上必然包含一流文化建设，文化的传承创新是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的重要战略任务，也是实现我国由高等教育大国向高等教育强国转变的必然要求和必然趋势。值此北京理工大学建校80周年之际，学校组织编写了《红色基因 不竭动力——北京理工大学文化建设的传承与思考》一书，深入挖掘了北京理工大学“延安根 军工魂”文化产生的背景，分析研究了“延安根 军工魂”文化的发展进程，挖掘提炼了“延安根 军工魂”的文化内涵，探索了“延安根 军工魂”文化建设与传播的途径方法，汇聚了近些年学校文化建设的成就与实例。

本书对建校以来学校的辉煌历程、办学理念、学科专业建设、人才培养等体现出的文化积淀进行了细致分析和论述，条理清楚、论述严谨、笔触深情，具有较强的理论性、创新性，充分彰显了北京理工大学的文化生命力与文化创造力，为坚定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的文化自信提供了有力支撑。

包丽颖

2020年7月

目 录

C O N T E N T S

第一章 北京理工大学的创建和发展	(1)
第一节 北京理工大学创办的历史背景	(1)
一、北京理工大学创办时的国际环境	(1)
二、北京理工大学创办时的国内形势	(3)
三、中国共产党对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的探索	(6)
第二节 近代以来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 (1840—1940)	(20)
一、19 世纪中期至 20 世纪初的中国高等教育	(20)
二、北洋政府时期和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高等教育	(23)
三、中国共产党在中央苏区兴办高等教育	(24)
第三节 北京理工大学 80 年的办学历程	(26)
一、延安时期的创校与办学	(26)
二、辗转华北时期的办学	(30)
三、迁入北平后的办学	(31)
四、北京工业学院时期的办学	(33)
五、更名北京理工大学后的办学	(36)
第二章 “延安根 军工魂”文化渊源	(40)
第一节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41)
一、中华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	(41)

二、中华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化	(45)
第二节 革命文化	(47)
一、革命文化的含义与特征	(47)
二、革命精神	(51)
第三节 陕北地域文化	(54)
一、陕北地域文化的形成	(54)
二、陕北地域文化的特征	(58)
第四节 青年文化	(59)
一、青年文化的含义与特征	(59)
二、延安时期青年文化的蓬勃发展	(61)
第五节 军工文化	(68)
一、军工文化的含义与特征	(68)
二、军工文化在北京理工大学的传承与弘扬	(72)
第三章 “延安根 军工魂” 文化内涵	(75)
第一节 文化与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	(75)
一、文化的含义	(75)
二、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	(78)
第二节 “延安根” 文化内涵	(83)
一、坚持党的领导，弘扬理想信念文化	(84)
二、坚持全心全意服务国家，弘扬爱国主义文化	(86)
三、坚持中国特色人才培养，弘扬红色精工文化	(88)
四、坚持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弘扬自强创业文化	(95)
第三节 “军工魂” 文化内涵	(97)
一、坚持国防教育，铸就献身国防的使命意识	(98)
二、坚守国防军工，铸就坚韧无我的高尚品格	(101)
三、坚持持续创新，铸就引领前沿的信心雄心	(102)
第四节 坚定“延安根 军工魂” 文化自信	(105)

一、“延安根 军工魂”文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组成	(105)
二、“延安根 军工魂”文化是建设“双一流”大学的内在要求	(107)
三、“延安根 军工魂”文化是建设“双一流”大学的精神动力	(108)
第四章 “延安根 军工魂”文化的建设与传播	(110)
第一节 “延安根 军工魂”文化体系建设	(110)
一、传承延安精神并赋予新的时代内涵	(111)
二、建设红色基因文化体系	(112)
三、强化文化筑基，以红色基因凝聚师生力量	(115)
第二节 “延安根 军工魂”文化建设实践	(118)
一、建设红色人才培养新模式	(118)
二、构建文化传承载体，建设红色文化地标	(118)
三、寻根精神原点，实践红色基因育人	(119)
四、加强舆论引导，传颂红色榜样	(120)
五、坚持德育为先，培养勇于担当的时代新人	(120)
第三节 “延安根 军工魂”文化建设和传播	(122)
一、文化建设和传播的指导思想	(122)
二、文化建设和传播的基本原则	(123)
三、文化建设和传播的主要内容	(124)
四、文化建设和传播的重要举措	(126)
五、文化建设和传播的政策建议	(130)
附录	(133)
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之路	(133)
校园文化建设之蓝图	(137)
校园文化建设之成果	(140)

文化建设优秀案例一	(143)
文化建设优秀案例二	(151)
文化建设优秀案例三	(160)
校园文化景观一：《北理工赋》	(164)
校园文化景观二：校训石	(168)
校园文化景观三：徐特立像	(169)
参考文献	(172)
后 记	(176)

第一章 北京理工大学的创建和发展

北京理工大学的前身是 1940 年创办于延安的自然科学院。她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创办的第一所理工科大学。至 2020 年，这所诞生于抗战烽火中的红色大学已整整走过了 80 年的办学历程。自创校以来，学校始终坚守办学的初衷和使命担当，在培养优秀人才的道路上不断前进，书写了北理工人为国家发展而拼搏奉献的奋斗篇章。

第一节 北京理工大学创办的历史背景

北京理工大学创办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当时中国正处于全民族抗战最艰苦的相持阶段。北京理工大学也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期间创办的，是一所革命特色浓郁的高等院校。就创办的历史背景而言，北京理工大学是感国运之变化、应民族之需要而诞生的红色大学。

一、北京理工大学创办时的国际环境

人类进入 20 世纪后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即 1914—1918 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和 1939—1945 年的第二次世界大战。这两次世界大战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对整个世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使世界格局发生

了剧烈的变化。两次世界大战之下，处于地球东部的中国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影响，中国社会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由此也发生了深刻的历史变革。

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后，各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竞争角逐日益激烈，终于导致了1914—1918年的同盟国集团和协约国集团之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此次世界大战把30多个国家、15亿人口卷入战争，“陆战之王”坦克登上战场，表现出其强大的杀伤力。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产生的一个明显变化就是世界各国间原有的格局被打破。1919年巴黎和会对战后问题也做出了处理。巴黎和会签订的《凡尔赛和约》及会后对其他战败国的和约，以条约法律形式确立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世界的政治、经济和军事的一般关系与制度。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欧洲走向衰落，德国的发展深受战争的影响，协约国集团中的英、法虽为战胜国，但是也受到一定程度的削弱，而美国、日本则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兴起，包括经济与军事在内的各方面的实力都不容小觑。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中国的北洋政府也被裹挟到战争之中而成为协约国成员。战后中国政府派出的代表以战胜国代表之名义参加了巴黎和会。在会上，中国政府代表提出了包括废除外国在华势力范围、撤出外国在华驻军在内的7项希望，并且提出取消日本强加的“二十一条”及换文的陈述书，但是遭到拒绝。会议还决定将德国在中国山东获得的一切特权转交给日本。中国政府代表最终没有在和约上签字。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失败的惨痛事实证明了弱国无外交的现实。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由于欧洲国家忙于战事，暂时放松了对中国的侵略，因此这一时期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经济获得了短暂的较快的发展，在某种程度上也正是由于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这个短暂的发展时期，中国的产业工人队伍在这一时期得以发展并壮大起来，为日后登上中国历史舞台的强大的无产阶级队伍的成长奠定了客观基础。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在世界各国重新“洗牌”的格局之下，近代以来列强对华的侵略也表现出了明显的变化。19世纪60—90年代进行

的明治维新为日本发展资本主义扫清了障碍，日本走上了资本主义的道路并获得了顺利发展。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日本军国主义势力进一步控制了日本政权，对内镇压人民，对外主张施行侵略扩张政策。1927年日本首相田中义一主持召开了“东方会议”，明确了把“满蒙”从中国本土分割出去的企图，并表示为达到这一目的不惜诉诸武力的意图。日本军国主义势力的“大陆政策”明确提出，“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使日本的对外扩张步骤和侵华政策进一步得到细化和具体化。20世纪30年代，随着意大利、德国、日本确立法西斯统治，欧洲和亚洲的战争策源地形成，世界再一次面临战争的威胁。1929年，以美国华尔街股票大跌开始，一场经济危机迅速席卷了资本主义世界，这是一场非常严重的世界性经济危机。日本也受到了经济危机的影响，为了转移国内视线，摆脱经济危机带来的不利影响，缓解经济危机带来的各方面压力，日本军国主义势力力图发动对华侵略战争。1931年日本发动了九一八事变，不久即武装侵占了中国东北；1935年10月意大利军队入侵埃塞俄比亚；1937年7月7日，日本蓄意制造了卢沟桥事变，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1939年9月1日德军入侵了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

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以世界反法西斯同盟国家的胜利宣告结束。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火遍及亚洲、欧洲、非洲、大洋洲，军队和民众伤亡超过了1亿人。战争期间中国人民饱受战争创痛，灾难深重，中国是日本侵略的最大受害国。从1931年开始，中国人民经历的长达14年的中华民族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牵制了日军兵力，减轻了其他盟军战场的作战压力，支援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其他战场的战事，中国付出了巨大牺牲，为最终赢得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做出了伟大的贡献。

二、北京理工大学创办时的国内形势

日本侵华战争爆发后，中华民族开始了长达14年之久的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这一时期，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中国人民抗日战

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是正义和邪恶、光明和黑暗、进步和反动的大决战。在那场惨烈的战争中，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开始时间最早、持续时间最长。面对侵略者，中华儿女不屈不挠、浴血奋战，彻底打败了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捍卫了中华民族5 000多年发展的文明成果，捍卫了人类和平事业，铸就了战争史上的奇观、中华民族的壮举^①。

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中国东北形势危急。面对日本的侵略，国民党政府却一再退让，奉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电告东北军日本此举不过为寻常寻衅性质。国民政府抱着不抵抗主义的态度，而日本则加大了对中国东北的侵略规模。在日军的进攻下东北沦陷，日本开始了对东北地区的殖民统治。1932年，以末代皇帝溥仪为“执政”的伪“满洲国”在日本的扶持下成立，伪“满洲国”确认了日本在中国东北的一切权益，使中国东北成为日本的殖民地。通过“日满共同防卫”“日满经济一体化”等政策的推行，日本垄断了东北地区的重工业、化学工业和铁路交通、通信等，肆意掠夺东北地区丰饶的资源，控制了东北地区的经济命脉。

占据中国东北以后，日本一方面加紧实施对东北的殖民统治，另一方面马上着手入侵华北地区，策划华北事变。1933年年初，日军向华北进犯，国民革命军第29军等部队在长城一线对日军予以奋起反击，而在南京国民政府急于消灭共产党领导的红军的背景下，5月南京国民政府与日本方面签订了《塘沽停战协定》。《塘沽停战协定》的签订为日军接下来进一步控制整个华北提供了方便。《塘沽停战协定》签订后，日本对侵略中国的策略做出调整，即暂时将对中国“武力鲸吞”的方式转变为“渐进蚕食”的方式。日方以“河北事件”进一步施压，南京国民政府令何应钦与日方代表梅津美治郎进行交涉，不久即达成了“何梅协定”。“何梅协定”中关于中国军队从河北撤退、取消或解散日本指定的国民政府党政机构、禁止抗日活动内容，极大

^① 习近平：《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2015年9月3日。

地削弱了河北地区已有的中国方面的抗日军事力量，而日本在华北地区的势力则由此得到了极大增强。通过这一协定，日本控制了河北的军事、政治、经济，取得了对中国华北的实际控制权。“何梅协定”的签订也为日本下一步要进行的分割华北提供了便利条件。1935年6月，察哈尔省代理主席秦德纯与日本关东军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签订了“秦土协定”，此协定关于取消在察哈尔省的国民党机构等内容又使中国丧失了察哈尔和河北两省的大部分主权。“何梅协定”与“秦土协定”签订的连带效应是加剧了中国华北地区的民族危机，同时为日本入侵和吞并华北提供了便利条件。不久，日本即着手策动华北五省（河北、察哈尔、绥远、山西、山东）以及北平、天津两市的“防共自治运动”，并扶植了“冀东防共自治政府”的傀儡政权。华北事变后，中华民族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危机，中国抗日救亡运动进一步高涨起来，1935年爆发的“一二·九”运动促进了中华民族的新觉醒。面对危急形势，全国各阶层人民掀起了抗日救亡运动高潮，纷纷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和杨虎城在西安发动“兵谏”，劝谏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是为“西安事变”。西安事变发生后，中共中央确定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在周恩来、张学良和杨虎城等人的共同努力之下，西安事变得以和平解决。西安变事的和平解决揭开了国共两党由内战到和平、由分裂对峙到合作的序幕，也标志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初步形成，西安事变成为当时扭转时局的关键。

随着日本的步步入侵，国民党政府仍是将其主要精力和部队主力用以“围剿”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奉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而对日本的侵略则妥协退让。在这种形势下，加之国际联盟和英、美等国政府当时对日本姑息纵容，日本进一步加紧了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准备。

1937年7月7日，日本阴谋策划了卢沟桥事变。由此，日本全面侵华战争开始，北平、天津失陷。卢沟桥事变后，国民党政府在正面战场抗战，中国共产党深入敌后开辟敌后抗日战场，依靠深厚的群众

基础建立起抗日根据地，中华民族全民族的抗战从此开始。日本采取“速战速决”侵华战略，迅速向中国华北、华东、华中、华南地区发起战略进攻，国民政府组织兵力与日军展开会战。在抗战的防御阶段，太原、上海、南京、广州、武汉等城市失陷。国民政府所在地在此期间由南京迁至重庆，重庆成为战时陪都。

中国军民的顽强抵抗使日军在1938年10月占领广州、武汉以后，被迫改变了“速战速决”的侵华战略，暂时停止了对国民党正面战场的战略性进攻。由于侵华日军作战战线拉长、兵力分散，在“以华制华”与“以战养战”策略之下，日本对国民政府采取了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方针。这一期间，日本诱降了汪精卫，扶植其成立了伪“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从政治层面分化中国的抗日力量。在占领区，日本进一步加紧安插特务机构、培植汉奸组织。对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日本则进行了疯狂的“扫荡”，用“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政策破坏敌后抗日根据地。

日本侵华战争给中华民族造成了深重灾难。面对着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中国共产党一方面领导抗日根据地军民采取机动灵活的抗战方式顽强抵抗，给予日军沉重的打击；另一方面，在抗日根据地领导人民群众进行了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建设工作。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面对极其严重的民族生存危机，中国共产党领导以延安为中心的陕甘宁边区军民自己动手、艰苦奋斗，逐渐建立了陕甘宁边区的经济体系。抗日根据地的建设不仅粉碎了当时国民党对边区的经济封锁，而且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奠定了重要基础。自然科学学院就是在抗战处于最艰苦的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延安领导创办的一所高等院校。

三、中国共产党对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的探索

晚清以降，主掌中国政权的清政府统治者仍然沉迷于“天朝上国”的迷梦中而不自醒，故步自封，闭关锁国，对于西方世界工业革命以来发生的一系列深刻变化仍懵懂不知，中国依旧处在自给自足的以农

业文明为基础的状态之下。直到西方列强纷至沓来，以船坚炮利洞开国门，中国社会遭遇了“数千年来未有之大变局”，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社会内部也发生了巨大变化。为了救国救民，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领导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掀起了救国热潮，但是革命党人的热血没有彻底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1921年成立的中国共产党开始了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探索，经过无数艰难险阻，终于找到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开启了中国革命崭新的历史局面。

1840年是中国历史的一道分水岭，由此，中国近代史拉开了帷幕。随着列强侵华以及中国在列强历次侵华战争中成为主战场，中华民族的民族危机也在不断加深，中国的近代化历程是从屈辱的列强入侵开始的。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的爆发，使中国迈进了近代。自此以后，先进的中国人痛定思痛，在反思和寻求救国救民的征途上悲壮地抗争、探索出路，向西方学习以摆脱落后挨打的现实成为近代国人的共识。于是，从船坚炮利等器物层面的学习到探索封建制度的变革再到进行思想文化层面的改变，为了救国救民，近代中国的各种阶级力量进行过一次又一次探索和尝试。19世纪中期农民阶级掀起的太平天国起义是中国近代史上农民运动的最高峰，建立了太平天国政权，定都天京。这场农民起义历时14年、席卷了大半个中国，一度与清政权成对峙之势并动摇了清政府统治的根基。但是由于农民阶级自身的局限性，其不具有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精神，改变不了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太平天国虽然出台了《天朝田亩制度》与《资政新篇》两个具有先进性的文件，但是囿于农民阶级自身局限性以及现实条件的不具备，这两个具有先进性的文件里面的内容只是流于纸面而从未真正在现实中实行过。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失败之后，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派开始了戊戌维新变法运动，维新派力图在维护清政府统治框架的前提下，依靠没有实权的光绪皇帝发布诏令、实施变革，但仅仅维系了103天的变法运动最终在以慈禧太后为代表的守旧势力发动的戊戌政变中失败，新法中只有创办的京师大学

堂被保留下来，资产阶级维新派的维新运动最终也没有改变中国的命运。孙中山先生率领资产阶级革命党人为民族命运奔走呼号，他最先喊出了“振兴中华”的响亮口号，在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的三民主义引导下开展资产阶级革命。1905年同盟会成立前后，资产阶级革命党人连续发动多次起义均遭失败，却没有动摇过孙中山等人的革命信念，他们在愈挫愈勇中坚持资产阶级的革命理想。1911年武昌起义的成功可以说是对资产阶级革命党人这种愈挫愈勇精神的巨大回报，武昌起义的成功迅速掀起了辛亥革命的洪流，清政府的统治在革命浪潮中风雨飘摇而终于难以维系。1912年清帝退位，标志着具有2000多年历史的封建帝制在中国的终结。辛亥革命最大的成功之处在于推翻了封建帝制，建立了中华民国，使民主共和的观念深入人心。但辛亥革命在成功的同时也是一次失败的革命，其后不久的袁世凯复辟帝制、张勋复辟都说明了辛亥革命的不彻底性。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妥协性加之资产阶级与封建势力千丝万缕的联系，都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资产阶级革命的前进步伐，而资产阶级在中外关系上的不明朗态度则决定了资产阶级领导的辛亥革命不能彻底地反对帝国主义。辛亥革命后的事实是封建帝制虽被推翻，然而中国社会的其他问题却依然如故。中华民国成立后、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的社会现实更加说明中国革命仍然任重道远。事实证明，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这条路在中国是走不通的，不能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的局面，近代国人还需要探索新的救国方案。

进入近代以来，具有觉醒意识的近代国人向西方学习，寻求救国方案，为中国摆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提供了有益的探索，积累了经验。但是一系列救国方案实施后并未从根本上使中国发生改变的现实，也激励着先进的中国人去从理论层面思索解决问题的方案，而近代中国发生深刻的改变也可以说就是从中国人接受和选择马克思主义开始的。马克思主义是历史的选择，也是人民的选择。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之前，中国知识界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和理解是比较模糊的，尚停留在零散而肤浅的认知层面，还没有形成对马

克思主义系统的认识。俄国十月革命之前，无政府主义、实用主义等许多西方的社会思潮都传入了中国，当时中国知识分子中有人将马克思主义看作是传入中国的所有思潮中的一种。据考证，19世纪末《万国公报》上曾刊载过名为《大同学》一书的第一章和第三章，其中提到了马克思的名字及其思想主张^①。但是受到当时条件的限制，《大同学》一书的这些关于马克思及其思想主张内容的影响还是非常有限的，也没有在广泛的意义上激起中国人对马克思主义深入的思考。

19世纪末20世纪初，尽管近代国人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了解非常有限，但是依然有人接触到马克思的学说，并且还有过简要的评介。1902年，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发表过文章对马克思做了简要的介绍，并说“麦喀士”（即马克思）为“社会主义之泰斗”，并预言“社会主义必将磅礴于二十世纪”。值得注意的是，这位曾经与康有为一起主导维新变法的维新派人士是当时中国比较早地介绍社会主义并提到过马克思的人。20世纪之初，资产阶级革命派中也有人介绍过马克思及其学说。比如1906年朱执信在其发表的《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小传》一文中对马克思、恩格斯的生平和学说进行了简要的介绍。以上史实说明，19世纪末20世纪初，近代国人中有知识分子已经知道马克思及其学说，但是可以看出，当时的中国人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介绍是非常不系统和不成熟的，也只是将其作为当时传入中国的所有学说和思潮中的一种予以关注的，并未形成理论层面的深入认知。

俄国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到了广泛传播，这与俄国十月革命有密切的关系。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事实使许多中国的先进分子对于十月革命背后的理论武器——马克思主义发生了浓厚的兴趣，更让他们进一步认识到一个道理：在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也可以用社会主义思想指引进行革命。十月革命后成立的苏俄劳农政府退出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反对帝国主义战争以及对华发表外交友好宣言的事

^① 方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译介源头探析》，载《中国翻译》，2019（6）。

实，也给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正在寻求救亡图存出路的中国人以深刻的启示和例证，激起了当时中国的先进分子如李大钊等人在关注俄国十月革命的同时对马克思主义产生浓厚的研究兴趣，重视对马克思主义的宣传，从而有力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近代以后，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就成为中国人民的历史任务。在旧式的农民战争走到尽头，不触动封建根基的自强运动和改良主义屡屡碰壁，资产阶级革命派领导的革命和西方资本主义的其他种种方案纷纷破产的情况下，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为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给苦苦探寻救亡图存出路的中国人民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全新选择^①。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既是历史的选择，也是人民的选择。

中国近代彻底的反帝反封建运动是1919年的五四运动。这场运动的爆发有着深刻的社会背景。一是新的社会力量即中国工人阶级力量的成长和壮大。从产生的时间上讲，近代中国工人阶级的出现是早于中国资产阶级的。早在1840年之后，随着清政府与列强的不平等条约中开放通商口岸等条款的实施，在上海、广州等早期的通商口岸就产生了近代中国最早的产业工人；而后，19世纪60—90年代清政府兴办洋务运动，在洋务运动中开办的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的工厂里也产生了一批产业工人。伴随着洋务运动历时30年的进程，中国近代产业工人的人数也在不断增加。在1914—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列强忙于战事暂时放松了对中国的侵略，中国的资本主义在这一时期获得了比较宽松的发展空间，这一短暂时期使得中国工人阶级的力量进一步壮大起来。至1919年五四运动前夕，中国产业工人的人数已达到200万人左右，从而使五四运动具有了广泛的群众基础。二是1916年开始的新文化运动的思想解放潮流影响了当时有进步思想的青年知识分子，而他们之中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的进一步成长也为五四运动积累了骨干力量。新文化运动提倡民主反对专制，提倡

^① 习近平：《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2018年5月4日。